

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

川东地下党的斗争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

川东地下党的斗争

(回忆录专辑)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重建、发展、 巩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情况.....	廖志高 (1)
重庆救国会和党组织的重建.....	漆鲁鱼 (25)
1939——1940年间的川东特委的一些情况.....	林 蒙 (32)
关于1938—39年重庆市青委和川东青委的一些 情况.....	张国钧、许立群、冯兰瑞 (49)
我所了解的川东特委和重庆市委.....	王致中 (55)
抗日战争初期重庆沙磁区地下党的建党斗争.....	黄大明 (57)
泸县中心县委的回忆.....	陈野苹 (71)
我在川东地下党的经历.....	肖泽宽 (78)
抗日战争初期北碚中心县委的情况.....	江浩然 (106)
抗日战争期间有关南充、江北党组织活动 的回忆.....	刘传藩 (112)
我们战斗在川南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	廖林生 (120)
抗日战争期中重庆地下党情况的一些回忆.....	何文述 (142)
王璞领导下的重庆工运小组.....	温静涛 (159)
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	邓照明 (161)
解放战争期间川南二工委工作情况.....	李治平 (174)

1946—1949年下川东党的组织与活动·····	卢光特 (192)
解放战争时期涪陵、丰都地下党的一些情况·····	刘渝明 (222)
对合川、铜梁(包括大足)、潼南、南充等县工 作的简单回忆·····	江伯言 (235)
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几次重要 工作部署·····	邓照明 (241)
川东同志去西康工作的一些重要情况·····	杨正南 (250)
我所知道的川东武装起义·····	刘隆华 (259)
我所参加的华蓥山武装斗争·····	陈伯纯 (273)
✓《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	俞 史 (295)
✓关于重庆地下党被破坏事件和《挺进报》·····	李维嘉 (317)
难忘的一九四八年·····	赵隆侃 (326)
一九四九年川东党组织工作概况·····	刘兆丰 (340)
1949年5月—11月上川东党组织概况·····	卢光特 (357)
解放战争时期重庆的学生运动·····	廖伯康 (370)
传达钱瑛同志对保护城市配合接管迎接解放指示 的一点回忆·····	江伯言 (384)
解放战争后期重庆工运概况·····	卢光特 (387)
重庆解放前夕我们的对敌策反工作片断·····	蒋仁风 (404)
从赴港学习到随军入川·····	黄友凡 (411)

抗日战争时期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 重建、发展、巩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情况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九月）。

廖志高

（一）重庆市委成立的经过。

一九三七年十月罗世文同志经过重庆时，对漆鲁鱼等同志和他们组织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问题进行了审查，审查清楚后，恢复了漆的党籍，杜延庆、郝威（罗青）同志的关系已转来，就由他们三人成立了重庆市工委，由漆鲁鱼同志任书记，杜延庆同志任组织部长，郝威同志任宣传部长，都是市工委委员，并要他们迅速大量发展党员。十二月省工委邹风平同志和我听了罗世文同志介绍后，同意了他的意见，正式批准成立市工委。这就是川东地下党重新建立起组织的开始。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份，杨述同志到重庆。市工委成立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发展党员很少，在发展党员方面的确有点关门主义。杨述同志去后发展就比较快，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发展了数十名。

一九三八年五月份，省工委根据罗世文同志传达的长江局的决定，将重庆市工委改成了重庆市委，派廖志高同志去兼任书记，漆鲁鱼任宣传部长，杨述任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限三个月内发展党员到一千人。这时，因为党要罗青同志去筹办清华中

学，杜延庆同志在工厂工作也很忙，就未参加市委，秋天，李应吉（宋林）同志来重庆，即由他任组织部长；王亦清同志也来重庆，即由他任工委书记。

我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份到达重庆的。当时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除重庆市以外，不论川东、川南、川北，只要有条件，我们都可以派人去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我到重庆后，对刘文化、刘圣化、刘参化、刘纯化等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市委认为都合格，就个别吸收他们入党。

在重庆市，我们派人到各学校，主要是大学、中学，普遍做工作，不久，在大学、中学都建立起了支部。

重庆市各区，建立起城区工委、新市区委、沙磁区委、江北区委。各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沙磁区主要是学校，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教育学院、南开中学、重庆女子职业中学、树人小学等；新市区主要是工厂，如二十一兵工厂、电厂等；城区主要是机关、企业单位。

对外县，只要能够派人去的地方，我们就派人去。万县、江津、丰都、荣昌、梁山、綦江、南川等共几十个县，都陆续派了人去，并在许多县建立了特支、县工委或县委。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重庆市委及所属各县已发展党员八百多人。这已发展很快了，但仍未完成长江局规定的任务。到一九三九年初，重庆市委原管辖地区，加上由川西特委划过来的泸州、宜宾两个中心县，党员已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

当时，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四川党一定要建立成秘密的党、警惕国民党突然叛变的指示，为了使新党员懂得党的基本知识，懂得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懂得怎样做秘密工作和遵守纪律，懂得如何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一边大量

发展党员，一边及时地进行教育。历史已经证明，要使党员树立革命信心，遵守党的纪律，及时地对新党员进行教育非常重要。

开始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建设、秘密工作、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等。关于宣传教育工作，“七大”后的“山头会议”写了一篇总结，这里不再多说。

我们在重庆，对新党员的教育有个有利条件，就是南方局驻在重庆，也办了训练班，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些同志。

现在看来，地下党办训练班，每期的人数不可过多，如果十几个人在一起，横的关系面比较大，不易保守秘密；如果每一期就只几个人，横的关系面比较少，就不大容易暴露。

一九三八年的暑假，重庆市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国民党中央大学里的两个人，一个施建生，一个勇龙桂，对党的事业丧失了信心，坚决要求退党。说什么，党的力量只有这样大点，怎么能把革命搞成功？杨述同志先去说服他们没有说通。我去找他们谈话，他们还是说，党的力量很小，要想革命成功，不知要等到那一年，我们退了党一样可以做工作。总之，无论如何要退党。我们向长江局汇报后，长江局确定由王明再同他们谈一次话，也没有说服他们。结果，我们把这两个人开除了。但以后没有发现他们干坏事。

世界上的事物是很复杂的。我们党内历来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看不到事物的发展规律，看不到事物的主流。实际上，当时形势是非常好的，我们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地 和 八路军、新四军也有大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影响已深入到了广大群众之中，全国的抗日群众运动方兴未艾，但施建生、勇龙桂却看不到这些，非离开党不行。

（二）川东特委成立，继续大量发展党员，开展救亡运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份，四川省工委扩大会议期间，王明、林若

吴老等路过成都时，他们决定：撤销四川省工委，不成立四川省委，分别成立川西（是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确定建立西康省后，才更名为川康特委的）、川东两个特委。川东特委的领导人选由我回重庆后请示长江局决定。

十一月我回到重庆后立即向长江局作了汇报请示。当时，长江局还有博古、董老、叶剑英、邓颖超、何凯丰等同志在重庆。他们把我找去开会，博古主持会议，研究决定：川东特委兼任重庆市委的职务，既是特委又是市委。书记由廖志高同志担任，漆鲁鱼同志任宣传部长，李应吉（宋林）同志任组织部长，王亦清同志任工委书记（管工运），杨述同志任青委书记（管青运），还一致同意了邓颖超同志的提议：由陈奇雪同志担任妇委书记（管妇女运动）。都是特委委员。这样，十一月间，川东特委即告正式成立。

川东特委成立后，宜宾、泸州两个中心县委就划归川东特委领导。

一九三八年底，长江局撤销，改为南方局，周恩来同志任书记。从此，我们就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一九四三年。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开始在机房街，南方局也设在这里。一九三九年“五三”、“五四”日机轰炸重庆，把机房街房子炸毁，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就搬到了红岩。

红岩这个地方怎么来的呢？原来南方局在重庆机房街的房子被炸后，没有个适当的办公地址，要我设法在郊区找一个地方。我想到红岩这个地方在郊区山上，主人饶国模虽是个大地主，但为人开明，并且她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党员，她又特别喜欢她的小儿子刘圣化。特委认为这个地方适当，如南方局同意，叫我让刘圣化同志和他的姐姐给他们的妈妈做工作。我向南方局报告同意后，就要刘圣化和他的姐姐们去同他妈妈商量，饶国模欣然应

允。以后就由办事处主任周怡等同志去同她谈。饶国模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妹妹，受有革命影响。这个人胆子大，她不怕，同意我们在那里修房子，还在备料和修建过程中为我们出了很多力。房子动工后，我们地下党同志就不与她家往来了，她的工作全由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去做。不久，她的儿女们由南方局先后送到了延安学习。这样，她与党的关系就更密切。红岩这个基地之存在，对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红岩这个地方很重要，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博古等同志都在那里。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是由南方局领导的。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从南方局在重庆设立，到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撤走，红岩这个据点都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南方局的领导机关设在红岩，但南方局做公开的统战工作则多在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南方局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一是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二是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的地下工作；三是领导有些地方的武装斗争；还有就是做些中央委托的其他工作。上层统战工作主要是南方局的同志负责，高级人士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亲自做。军事方面是叶剑英、王梓木、薛子正等同志去做。经济方面是许涤新等同志做。文化方面是徐冰等同志做。妇女工作（包括统战）由邓颖超等同志做。八路军办事处的行政工作由钱之光同志统管。总之，上层的公开的统战工作都由南方局同志出面做。各省、区主要侧重秘密地做中下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

从南方局领导开始，一九三九年我们主要抓了以下这些工作，继续大量发展党员，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对新党员进行教育。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央下达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以后，十月，我们召开了川东特委扩大会议，确定我们的工作重点立即

逐渐转入巩固党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在没有党员或者党员极少的地方，还可继续发展党员（这一年，发展了四、五百人），继续开展群众运动。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川东地区才完全停止发展党员。这时统计（根据一九四一年一月底向中央的报告），除去一九四〇年底以前被破坏及撤走的以外，还有党员二千四百七十多人。

川东地区发展党员最多的是一九三八年、三九年。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继续大量发展党员，必须注意质量，按中央指示建立秘密的党组织，警惕国民党的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去做。这些指示，我们都作了传达贯彻，而且在三九年我们一再强调质量，反对“拉夫主义”，加强教育工作。同时仍然强调要按照过去的规定：入党人要写申请书，要有介绍人和介绍人的意见，经过审查批准后，要个别举行入党仪式，由上级负责人、介绍人、入党人参加，都要讲话。入党后要按规定交党费。一九三九年底统计，这一年又新发展了党员一千一百多人。但以后检查，因为一九三八年发展的大都是些“救亡”积极分子，比较暴露，比较“红”，特别是受王明的右倾错误影响，规定指标，限定时间完成，以致许多地方降低了党员标准，有的只要是抗日积极分子就接收；有的只要是工农成份、政治纯洁，就不管觉悟程度；有的只看到他拥护党，就不管其他条件；有些是几个人在一起举行入党仪式；有的在审查入党申请书时，对政历审查不仔细，以致混进一些投机分子、落后分子和坏人；许多地方未严格执行候补期，有些后补党员也介绍别人入党。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又检查纠正得慢，以致后来遭受一些损失。

现在看起来，当时漆鲁鱼等同志组织的“重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为党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他们对川东地下党在短时期内很快得到发展是有贡献的。但是，也留下一些问题，暴

露的人不少。加上发展时的缺点错误，就给巩固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

一九三九年，我们普遍在大、中、小城市和各县发展党员，主要是吸收合格的工人、学生、教职员和农民入党，在各县发展了许多小学教员和一些农民入党。夏初，我到万县地区检查工作时，在云阳县的一个学校，发现一些小学教员同农民的关系搞得很好，发展了一些农民入党。我向特委汇报后，特委就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并要他们很好注意做盐厂工人的工作，发展工人入党。

一九三九年底，对于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我们缩小了规模，改变了形式，继续进行。这时，停止“救国会”的工作，不再采用过去那样大规模的、轰轰烈烈搞的形式了，改用主要是成立比较小的、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的读书会、联谊会、友谊会等。利用这样一些名义做群众工作，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还尽量利用公开的合法组织搞抗日救亡工作。如在邓颖超同志的指导下，对“妇女慰劳会”，理事长是宋美龄，我们就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地位，大力开展各项活动，做了很多工作。关于这个组织的详细活动情况，《四川党史资料》上已经登载了几篇专题材料，写得不错。又如搬到长寿县的重庆联中，三九年下半年，一场广大学生反对反动校长（青年党分子）的斗争取得胜利，就是统一战线做得好的典型。当时学校当局开除进步学生，引起学生不满，我党支部组织进步学生，团结三青团和无党派学生，大家联合起来反对校长这种做法。这次风潮闹得很厉害。结果这个校长被省教育厅撤换了。群众和斗争领袖没有一个被捕和被开除的，而且没有发现是我们党的支部和党员在领导。这就是下层统一战线成功的经验。另外，也有错误的做法。在北碚有的同志不懂得国民党的真面目，擅自搞“自愿参军运动”，

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扩大军队，中心县委批评了他们，特委同意了中心县委的意见。总之，群众工作中的好坏典型都不少，这里不再多举。从一九四一年起，主要是做交朋友的工作。

（三）各级党组织及领导人发展变化情况。

川东特委：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成立，由长江局领导两个月，一九三九年一月开始，长江局撤销，由南方局领导。一九四三年九月川东特委撤销，分别建立上川东特委、下川东特委。历时共四年零十个月。其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川东特委还兼重庆市委职务。

这五年，川东特委书记一直由廖志高同志担任。那时，廖对外用过汪平、汪琦等若干个化名。廖志高是学名，在校读书、参加长征和重返延安以及建国后都用的是此名。

组织部长：先后有李应吉（宋林）、余代生（于江震）、曾淳。

宣传部长：先后有漆鲁鱼、林蒙、荣高棠（兼）。

工运部长：先后是王亦清、王致中。

青委书记：先后是杨述（杨德基、陈光）、许立群（杨耳，代理）、荣高棠、孙敬文。

妇委书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底是陈奇雪。陈调往延安后未再选上适当的人。

以上均为特委委员。

秘书长：李维（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四月）。

海员工作委员会（特委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部门，专管长江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经营的几十条轮船的海员工作）：书记先后有黄亦仁、江浩然、马六甲等，樊恒才、许建业也在其中负过责。下面分别建立有：水手、轮工、理货、舵工、领江等工会和支部。有的只有个别党员。他们的工作颇有成绩。

还有郝威、许晓轩、冯兰瑞、杨修范等同志任过特委青委委员。汪敏、徐邦贤等任过特委妇委委员。

重庆市委：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川东特委成立兼任市委职务，既是特委又是市委，直到一九四〇年一月才单独成立市委，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一九四〇年一月前，市委负责人已在前面记述，这里不再重复。从一九四〇年一月到一九四三年九月，市委负责人及其变动情况如下：

开始时，书记：王致中（兼）。

组织部长：郭汶（郭祖烈）

宣传部长：赵利峰（赵秀铨）。

妇委书记：汪敏。

改组后，书记：江涛（莫止、李德春）。

组织部长：汪敏。

宣传部长：刘传彝。

妇委书记：汪敏（兼）。

一九四二年冬重庆市委书记是孙仁（湖南人，一九四八年在华盖山牺牲），委员有彭咏梧、何文连。

一九四三年九月川东特委撤销，分为上、下川东特委以后：

上川东特委，书记孙敬文。

下川东特委，书记曾淳。

重庆市所属各区、县委：

城区区委书记，先后是甘丹、樊恒才、汪敏、白英，委员有过温士一、王文、李治平等。以后分为上城区区委书记，下城区区委书记。下城区区委书记是白英，委员有曾冕、黄晓行等。上城区区委书记是甘丹，委员有王文等。

新市区委，书记：先后是江涛（莫止、李德春）、熊宇忠、魏新学。委员：最初有汪敏、乌江、王世槐、许晓轩。

沙磁区委，书记：先后是兰毓钟、陈实、黄大明、刘作先、荣高棠（兼）、魏琼。委员：有过沙铁瀛（女，南京人）、曹子明（重大学生）、徐淡庐等等。

化龙桥区委，书记：先后是白英、王大化。委员：有过赵忍安、李道源等。

江北县委（后划归江巴中心县委领导），书记：先后是郝威、黄觉菴、田家英（陈野萍）、郑理中、曾德林。委员：曾有王健明、刘大震、黄致祥、李光明等。

巴县县委（后划归江巴中心县委领导），书记：先后是罗浩（欧汝钦）、肖泽宽等。委员：曾有徐邦贤、蒋歌浪、李思源、李书直等。

川东特委直属各中心县委和县级组织：

宜宾中心县委，书记（一九四〇年初划归川康特委前后）先后有：廖寒非、韩天石、林蒙、李维、彭世荣等。

泸州中心县委，书记：先后有李亚群、涂万鹏、田家英（陈野萍）、郭福玉（代理）、罗浩、廖林生等。李亚群任书记时，刘隆华（女）任中心县妇委书记，万进修、何作舟、曾仲牧任常委，涂万鹏任江安县委书记。以后肖泽宽任中心县职工部长。

北碚中心县委（即合川中心县委），北碚最先是成立特区区委，书记是沈钧，组织部长江浩然，宣传部长方璞德。以后成立中心县委，书记先是李亚群，王世槐任宣传部长，江浩然任组织部长，妇委书记刘隆华（也兼任过一段组织部长），青委书记朱鸣（或徐鸣）。江浩然去延安后，再启西任组织部长，李亚群走后，艾英（杨德培）任书记。

万县由特支发展到中心县委，特支书记是欧阳克明，中心县委书记是黄树澄、杨正南、艾英（杨德培）、彭咏梧（因有的组织被破坏，万县中心县委即移到梁山县，成立梁山中心县委）。

南充中心县委，书记（一九四〇年初由川康特委划归川东特

委前后)：先后有刘传藉、陈震、田家英(陈野萍，这时中心县委移到广安)、杨正南(中心县委又移回南充)。

江巴中心县委，书记：赖少尧、罗浩、肖泽宽。委员，有李治平等。

五县工委，书记：张显仪(王家释)等。

蔡(江)、南(川)工委，书记先后有：夏奇峰、陈慕桥、周应培、李思源、李治平。

江津县委，一九四一年重建，书记：秦朝亨、周朝生、周平。属江巴中心县委领导。

永、荣、隆工委，书记：周平、廖林生。组织部长何乃述，宣传部长何君辉。

(四)川东地下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事件。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不仅迭次进攻解放区，同时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制订了许多办法，如《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方案》等等，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地下党。川东地下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事件，主要是在一九四〇年、四一年。在此前后就比较少。回忆起来，川东曾发生过以下破坏事件：

一九三九年“五·一”节那天，特委青委书记杨述同志不慎被捕。当时杨述等同志组织了几千人在夫子池召开庆祝大会，宣传我党的主张，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国民党不好公开反对，就派宪兵守卫会场，以维持秩序之名进行监视。大会事前规定，与会人员都要按组织整队集体入场。杨述同志因去沙坪坝联系一个党员，回来时想参加大会，被宪兵阻挡，他坚持要进，就同宪兵打了起来，把身上带的一些《新华日报》等红色材料掉到了地上。因此，宪兵立即把他抓起来送往宪兵司令部。途中，杨述同志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

当时，我和宋林、徐邦贤（女）同志三人住在一处，是杨述他们中途经过之地。我们听到街上闹哄哄的，打开窗子一看，见杨述同志被抓，就立即报告了南方局。南方局当即同国民党交涉，说杨述同志是我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想去参加庆祝“五·一”节大会，同宪兵发生冲突被抓了，要他们立即放回。结果，第二天国民党就把杨述同志放回南方局。南方局考察后决定给予几年之内不能担负领导职务的处分。不久，即送回延安。

本来，这件事是清楚的，杨述同志没有自首、叛变问题。但以后，杨述同志为此不知被整了多少次，特别是延安抢救运动，康生有意诬陷好人，对杨述同志揪住不放，并多次残酷毒打。直到一九四三年我回到延安后，才给杨述同志澄清了这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六月，特委组织部干事赵万齐（西昌县人）去飞机场联系同志，因行动可疑被捕，关押在国民党重庆市公安局，可能自首供人，但实际并未扩大破坏，后释出去八路军办事处接关系未批准。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重庆市南岸党员胡甫章，不知怎么暴露的，被敌人逮捕后他就叛变了，供出了两个同志：一个是川盐银行茶房（勤杂工）谭世明。接着，谭世明同志被捕。但谭被捕后表现很好，立场非常坚定，什么都不讲。所以，与他联系的同志都没有受影响。谭世明同志被国民党关押至死。我一直认为：谭世明是个坚贞不屈的好同志，应该定为烈士。另一个是南岸铜元局兵工厂工人党员，被捕后表现不详。重庆市委开除了胡甫章。

一九三九年十月，江津特支书记王世煥被捕。南方局通知说他已叛变，我们就把他开除了。以后调查，这次破坏共有四人被捕，即：方圭德，安徽中学学生，特支宣传干事，自首了；熊汇鳌，安徽中学学生；岳清刚，国民党军政部被服厂工人。

一次反共高潮后，奉节县委书记被捕叛变，使全县三十多人

被捕。同时使开县全县党组织也遭破坏。

一九四〇年，新市区委许晓轩（相当于区委常委）去二十一兵工厂工人支部接头，这个被接头的人就把许晓轩同志抓捕了。以后听说这个被接头的人就是特务打进党来搞破坏活动的。许晓轩同志当时的社会职业是黄炎培组织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员。许晓轩同志被捕后表现得非常坚强，任凭敌人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什么都不讲。新市区委负责人员一直安全无事。就这样，国民党把他视为要犯，关押在渣滓洞，以后壮烈牺牲了。我认为：许晓轩同志亦是应该定为烈士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黄晓行（城区区委委员）被捕。黄去参加一个新党员入党仪式，被这个新党员（内奸）指引特务逮捕。当时黄发觉后曾由下半城跑到上半城，在临江路某委托商行，敌人使用瓦斯枪，黄中毒昏迷，被捕自首。出狱后曾写有材料，川东特委未批准其恢复党籍。黄系延安马列学院学生，后来到贵州去了。介绍那个内奸入党者是“新中国书店”之陈某（名字记不起了）。这几个人都割断了关系，并通知了他们所知道的人立即转移。

一九四〇年江北尹家被搜事件。尹家被搜查，尹××（女）及其母被捕。原因及以后情况均不明。

民生公司事件。该公司职员汪漂萍被捕，先后情况不明。

五县工委下面一些同志被捕，书记张显仪（王琛），却只身跑到重庆向办事处报告。究竟是什么原因始终没有查清楚。当时，涪陵、丰都、忠县等三个县破坏的厉害，仅丰都县三十三名党员均被捕，但石柱、长寿两县还保存得比较好。

一九四〇年初南充中心县委由川康特委划归川东特委，派人去联系时已遭破坏。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彭红岩，被捕逃出后因要一个小孩去取行李，破坏了机关，驻机关的中心县委秘书余鸿烈被捕。那个送信的小同志亦被捕。以后，彭到了重庆，自称“越